

中国音乐文物 大系

天津
陕西
卷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七家出版社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陕西卷 天津卷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大象出版社

美术总设计 张 森
版式设计 朱鸿年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陕西卷 天津卷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焕斌

责任印制 石文波

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

(中外合资)深圳新海彩印有限公司承印

787×1092 毫米 1/8 33 印张

1999 年 10 月第 2 版 199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410 册

ISBN 7-5347-2015-X/K · 58

定价 430.00 元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顾问 吕骥 阴法鲁 谢辰生
王世襄 李纯一 苏秉琦

总主编 黄翔鹏

副总主编 王子初（执行） 王世民 周常林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承源 王芸 王子初 王世民 方建军
冯光生 乔建中 刘东升 李亚娜 李志和
吴钊 张森 张振涛 周吉 周昌夫
周常林 郑汝中 赵世纲 项阳 秦序
袁荃猷 徐湖平 高至喜 陶正刚 萧恒杰
彭适凡 蒋定穗 董玉祥 韩冰 熊传薪
霍旭初

项目总协调 乔建中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主任 王子初

副主任 王芸（本卷执行编辑） 刘正国 张振涛

测音技术总监 韩宝强

摄影图片总监 王子初 刘晓辉

陕西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著
西安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编辑委员会

顾问 陈全方 鲁日融 巩启明
主编 方建军
副主编 尹申平
编委 方建军 尹申平 韩保全 成建正 张明惠

天津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编著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天津卷》编辑委员会

主编 黄崇文
副主编 刘东升
编委 李孔椿 王宜恭 尤仁德 孙宝发 王璧
摄影 董建国 张一苓 池卫 刘士刚 李国强
测音 顾伯宝 徐桃英 韩宝强
撰稿 刘渤 刘丽芳 高俊清 李多云 安琪
黄崇文 田忠彦 徐春苓 李东琬 张淑珍
纪烈敏 李元玲 杨小华 郑华



前　　言

黄翔鹏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这项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过是表示我们并不以编辑出版各省卷本的“音乐文物集成”为终极目标。随着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与音乐有关的古代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音乐考古专家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预期这项工作在“集成”的基础上，还将进入全面的、系统化的梳理阶段，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最为宏大的工程。

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间，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倡导并且亲自深入音乐文物田野的调查工作，直至倡议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发现了中国青铜钟的双音结构，巧逢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具有铭文为证的青铜双音钟的出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对于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

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诸如贾湖骨笛提供的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乐音结构，便是一种即便是远古崖书中亦无从得知的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历史信息。它忠实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某种人类文明的曙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正当文化学的概念开始进入考古学，从而扩大了考古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畛域。音乐考古学如能产生长足的进展，将来无疑可以用己之长，回报于一般的考古学。

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是多侧面的，其重要的迹象之一是和文化人类学的互相靠拢。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将在这方面提供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和现象。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也将因此而面临着有关学科建设中的特殊问题。

古代的陶瓷、丝绸织物、绘画和雕塑作品等，本身就是考古研究的对象。陶瓷考古、丝绸考古、美术考古的文物依据直接就是有关器物或艺术品本身，其考古学的描述和具象物体本相一致。但绝不可能“取出”任何一件“音乐作品”，对它直接进行考古学的研究。从考古学现有严格定义说来，“音乐考古”一词，似乎难予认证，充其量只可说是“乐器考古”或“音乐文物遗存的考古”而已。在人类文化



史上可称最为古老的“音乐艺术”，作为一个古老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这是时间的艺术，“心灵的”而非“物质的”艺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重要界限之一是考古学永远也不去直接选择精神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我们注意到古代音乐艺术虽然是无形无体而不可驻留的，但它的一切表现却无非都是“物质的”信息。从成系统的信息之间对它们进行结构关系的研究，恐怕音乐信息（例如：骨笛、陶埙、石磬、青铜钟的音阶）稳定和有序，要远远高过那些有形有体的艺术品所能带有的信息量（例如：线条的疏密长短，色彩的深浅），其内在结构所体现出来的惊人的稳定性反而使得后者相形见绌。

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过程中，为了谨防由于当前认识的局限而丢弃了某些未被认识的有用材料，本书在收录范围方面是掌握得略为宽松的。诸卷本既重形制数据，也及测音资料；既重考古发掘，也收传世器物；既重乐器实物，也不忽视反映古人音乐生活的绘画、雕塑等美术作品。古人乐舞不分，故一些重要的舞蹈文物乃至乐舞道具也适量收录。

“乐音信息”的收集、采录，是强调“乐音信息”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能遗留至今的物质信息也应成为考古研究的直接对象的意思，而并不意味着要对考古学的学科范围进行修改。当代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对于古代音乐遗留至今的某些信息作了确认以后，已在“曲调考证”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但却不能、也不应该如有的研究者那样，把它径称做“曲调考古”。音乐艺术在国际上有“无形文化财富”之称，这种无形之“物”，如前所述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得到考古研究的直接帮助。这并非蓄意混淆学科界限，从而亵渎考古学庄严的科学殿堂；而是为了在齐心共建这座宏伟殿堂的事业中，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一份辛劳。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从事的是铺砖叠瓦的工作。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编 者 的 话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出版,是我国音乐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

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十分丰富,既有大量极其珍贵的乐器实物,又有许多颇为生动的形象资料。其数量和品种之多、跨越时代之长,是其它文明古国无与伦比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迅速发展,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研究改变了单纯依靠文献资料的状况,注意考察各地出土的有关实物资料,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特别是1977年进行的甘、陕、晋、豫四省音乐文物调查以及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与研究,所获突破性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况下,大力开展对现有音乐文物的全面调查和系统整理,以促进中国古代音乐和历史考古领域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也就成了一项迫切的学术任务。1985年初,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提出编辑《中国音乐文物图录集成》(多卷本)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以及有关单位和专家的赞同。同年4月15日,召开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商洽此项编辑工作的有关事宜。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迟迟未能正式启动。

1988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所长的主持下,将项目名称确定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成立了黄翔鹏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及其所属总编辑部,并申报列入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申报前,曾约请有关专家多人,对此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国家文物局于1988年7月15日发出《关于协助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将此项工作列入工作日程,对本地区本部门所发现和收藏的音乐文物进行清理,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我国古代音乐发展水平的精品,编成《大系》的各省分卷。随后,这项工作在湖北、北京、陕西、天津、上海、江苏、四川、河南、甘肃、山东、山西、新疆、湖南、江西等地先后得到落实,并逐步取得进展。其中《湖北卷》着手最早,摸索出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主编王子初根据《湖北卷》的工作实践,制订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

1992年3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编辑出版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审定编撰体例和工作进度。通过讨论进一步明确:本书以省分卷编撰;不是图录,也不仅是普查资料汇编,而是音乐文物集成性质。会上讨论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对其中的音乐文物命名、常见器种及部位名称的规范、全书的分类体系、条目说明的撰写提纲,以及卷首综述的要求等主要内容,取得了共识。其后,《大系》的编撰工作遇到了资金和人事方面的困扰,致使工作几乎陷于停顿。1993年底,音乐研究所正式委托王子初担任《大系》执行副总主编,并主持总编辑部工作。经其多方奔走,《大系》的工作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并会同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妥善解决了部分编撰经费和出版资金。与此同时河南教育出版社(即现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使此套丛书的早日出版成为现实。1995年6月24日至26日,总编辑部在江苏昆山市召开了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做了全面动员,并检查了各卷的进展情况。会上,河南教育出版社与总编辑部签订了出版意向书,不久又签订了正式出版合同。至此,《大系》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本书从立项到首卷出版,历时将近10年。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乔建中所长直接主持了从立项到出版等一系列工作,并始终关心着工作的进展。本书的每一册书稿,都经过王世民副总主编的认真审阅,在考古学专业方面,起到了把关的作用。

本书的编撰工作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由于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各地有关同志的勤奋努力,使各个分卷得以陆续完稿并交付出版,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作为总编辑部,由于工作人员较少,业务水平有限,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凡例

一、《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文物藏地分省（区、市）卷编撰，不以文物出土地域分卷。各省（区、市）收藏品原则上归该省（区、市）卷收录。

二、文物命名原则

1. 沿用旧名。
2. 以器物自铭、器主或墓主命名。如曾侯乙编钟、秦王卑命钟等。
3. 以出土地命名。一般格式：县（市）名+出土地点名+墓葬号+器种名。如信阳楚墓编钟、长治分水岭14号墓编磬、当阳曹家岗5号墓瑟等。
4. 以文物自身的显著特征命名。无出处、无款无铭的传世、征购、罚没文物，以此法命名。文物自身特征包括：纹饰、造型、色泽、材质、年代、文化属性、使用者、收藏者、作器者等方面。如虎纹石磬、龙首铜编磬等。

综合以上各点，一般先考虑沿用旧名，无旧名者可用器主、墓主、铭文命名，或退用出土地、文物自身特征命名。必要时结合使用命名。

三、编目分类

1. 各卷以“器类法”为一级分类，即将文物分为乐器、图像两大类。类外文物就近归入其中一类。如少量出土书籍附入图像类。特殊情况单独成辑。如曾侯乙墓专辑。
2. 乐器类文物数量及种类较多时，用“材质法”〔如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竹）器等〕作二级分类（暗分），继以“种类法”（如钟、钲、鼓、瑟、箫、笛等）作三级分类。数量及种类较少时径用“种类法”为二级分类。“种类”以下，按大致年代顺序排列各条目。
3. 图像类以下视文物构成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作次级分类。

四、条目撰写体例

顺序号 条目名称（即文物名称）

时 代

藏 地 （或附馆藏号、田野号）

考古资料(来源) 文物出土（或征集）时间、地点、发现经过（或流传世系）、共存物、历史背景、文化属性、器主、现状等情况。

形制纹饰(画面内容) 保存情况及材质，形制结构，纹饰特征、铭文及释文等。形制数据可列表。

音乐性能 使用及调音遗痕，特别的使用方法，音响性能，测音结果及与音乐有关的其它内容。测音结果可列表。

文献要目 作者，篇名或书名，出处（与该件文物无直接关联的文献不予收录）。

例如：

2. 随州季氏梁编钟（5件）

宗支。

时 代 春秋中期

形制纹饰 18、2号钟有不同程度残损，余保存完

藏 地 随州市博物馆（18；2~5）

整。5钟同式，大小相次。钮呈长方环形，舞平，钟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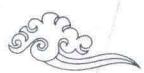
考古资料 1979年4月经发掘出土于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季氏梁西侧一春秋墓。墓葬封土已被村民平整土地时取走，墓坑内葬具均腐，仅存木炭及残丝麻织物，其下铺有朱砂。与编钟同出有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等，共44件。其中有体现墓主身份的鼎和簋。有1件

若合瓦，于口弧曲上收。舞底正中有一直径为0.5厘米的圆槽，钲部内腔壁上各有一长1.0、宽0.5厘米的长方形槽，槽或穿透或不透，系铸造时铸范芯撑遗痕。18号钟素面，口无内唇。余钟两面均饰夔龙纹，于口有内唇。形制数据见附表12。

簋铭：“陈公子中庆自作匡簋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寿用之”可为断代依据；2件戈铭：“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戈铭说明古曾国是周朝分封的姬姓国，墓主为周室

音乐性能 4、5号钟内唇上各有调音锉磨的半圆形对称缺口8个。2、18号钟哑，余钟上均能得双音。

文献要目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目 录

陕西卷

陕西音乐文物综述	1
第一章 乐 器	5
第一节 陶埙 陶角	7
1. 半坡陶埙	7
2. 姜寨358号墓陶埙(2件)	8
3. 姜寨陶埙	9
4. 淳化黑豆嘴陶埙	9
5. 西安热电厂猴头埙	10
6. 华县井家堡陶角	11
第二节 陶响器	12
1. 姜寨358号墓陶响器	12
2. 姜寨76号墓陶响器	13
3. 铜川李家沟陶响器	13
4. 黄龙西山坡陶响器	14
第三节 磬	15
1. 蓝田怀真坊特磬	15
2. 扶风齐镇特磬	16
3. 周原召陈乙区遗址编磬(3件)	16
4. 扶风云塘石磬	18
5. 宝鸡上官村石磬	18
6. 秦公一号大墓编磬(8件)	19
7. 西安红庙坡汉墓陶磬	23
8. 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陶磬	23
9. 延安庙沟村泗滨浮磬	24
第四节 错 锋 铃	25
1. 宝鸡竹园沟13号墓错	25
2. 强伯旨墓锋	26
3. 庄白一号窖藏铃(7件)	27
4. 黄龙西山坡铃(2件)	27
5. 长乐富贵铃	28
第五节 甬钟	29
1. 强伯各墓钟(3件)	29
2. 强伯旨墓钟(3件)	31
3. 临潼零口南罗钟	32
4. 扶风黄堆4号墓钟	33
5. 扶风上务子钟	33
6. 凤翔东关钟	34
7. 应侯钟	35
8. 一式疾钟	37
9. 二式疾钟(4件)	39
10. 三式疾钟(6件)	41
11. 四式疾钟(3件)	45
12. 五式疾钟(3件)	47
13. 六式疾钟(2件)	49
14. 七式疾钟(2件)	50
15. 中义钟(8件)	52
16. 柴钟(8件)	55
17. 师曳钟	58
18. 五祀鼓钟	59
19. 眉县杨家村甲组甬钟(2件)	60
20. 眉县杨家村乙组甬钟(4件)	63
21. 眉县杨家村丙组甬钟(4件)	65
22. 井人妾钟	68
23. 用享钟	69
24. 南宫乎钟	70
25. 扶风北桥钟甲	71
26. 扶风北桥钟乙	72
27. 扶风蝉纹钟	73
28. 扶风东渠钟	74
29. 扶风刘家村钟	74
30. 扶风齐家村钟甲	75
31. 扶风齐家村钟乙	76
32. 岐山梁田钟	77
33. 扶风吊庄钟(5件)	78
34. 长安马王村钟(10件)	80
35. 耀县丁家沟钟(4件)	83
36. 鲜钟	86
37. 武功李台钟	86
38. 武功徐东湾钟	88
39. 临潼零口钟(13件)	89
40. 秦公钟(5件)	92
41. 宝鸡冯家嘴钟(2件)	96
42. 宝鸡西高泉钟	97
43. 西安红庙坡汉墓陶钟	98
44. 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陶钟(5件)	99
45. 汉元帝渭陵钟	99
第六节 钺	100
1. 眉县杨家村编镈(3件)	101
2. 秦公镈(3件)	104
3. 应钟镈	105
4. 至正元年镈	106
第七节 钮钟	107
1. 凤翔直柄钮钟(2件)	107
2. 直柄钮钟	108
3. 眉县金渠钟(5件)	109
4. 凤翔钮钟	112
5. 咸阳钮钟	113
6. 乐府钟	115
7. 西安红庙坡陶钟	116
8. 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陶钟(10件)	116
第八节 钹 钧子	117
1. 西乡望耕台铜钲	117
2. 旬阳烟厂钲	118
3. 秦俑一号坑钲	118
4. 咸阳塔儿坡𬭚于	119
5. 安康𬭚于	119



第九节 腰鼓 锣 镲	120	第三节 乐舞俑	149
1. 西安大明宫瓷腰鼓	120	1. 西安范南村 92 号汉墓奏乐俑(一)	149
2. 西安关庙铜锣	121	2. 西安范南村 92 号汉墓奏乐俑(二)	149
3. 宝鸡毛家庄铜钹(1副)	121	3. 淳化常村吹奏陶俑(2件)	150
4. 扶风虎王村铜钹(2副)	122	4. 西安草场坡说唱陶俑(2件)	150
5. 扶风黄堆乡铜钹(2副)	122	5. 西安草场坡吹奏陶俑	150
第十节 瑟 阮咸	123	6. 西安草场坡骑马击鼓陶俑	151
1. 西安红庙坡汉墓陶瑟(2件)	123	7. 长安县隋墓骑马奏乐陶俑(2件)	152
2. 西安范南村 92 号汉墓瑟枘(4件)	124	8. 长安县隋墓乐舞陶俑(3件)	153
3. 西安中堡村陶阮咸	124	9. 郑仁泰墓骑马吹笛陶俑	154
第二章 图 像	125	10. 郑仁泰墓骑马吹筚篥陶俑	155
第一节 雕刻	127	11. 麟德太子墓骑马吹笛三彩陶俑(4件)	155
1. 绥德四十铺盘鼓舞画像石	127	12. 麟德太子墓骑马吹筚篥三彩陶俑(4件)	156
2. 绥德四十铺盘舞画像石	128	13. 麟德太子墓骑马吹排箫三彩陶俑(4件)	156
3. 绥德延家岔乐舞画像石	129	14. 西安豁口唐墓骑马乐舞陶俑(13件)	157
4. 绥德延家岔击建鼓画像石	129	15. 倗失十囊墓奏乐陶俑(6件)	161
5. 绥德张家砭击建鼓画像石	130	16. 西安中堡村唐墓骆驼载乐俑	163
6. 绥德刘家湾击建鼓画像石	130	17. 西安唐墓彩绘乐俑(6件)	163
7. 乐舞杂技石雕	130	18. 西安万寿路唐墓弹琴陶俑	166
8. 淳化方里乡奏乐图石雕	131	19. 西安热电厂唐墓三彩击腰鼓陶俑	166
9. 夏侯董祭乐舞造像碑	132	20. 西安韩森寨唐墓说唱陶俑(2件)	167
10. 张柒奏乐图造像碑	133	21. 西安田王村唐墓三彩戏弄陶俑(2件)	167
11. 西安灞桥镇乐舞雕砖	134	22. 西安韩森寨唐墓粉彩奏乐陶俑	167
12. 石刻奏乐图佛座	134	23. 西安大兴路唐墓粉彩乐舞陶俑(5件)	168
13. 延安王庄奏乐画像砖	135	24. 西安韩森寨唐墓侏儒俳优陶俑	168
14. 西安红旗乡乐舞雕砖(5件)	136	25. 西安郭家滩唐墓骑马吹指陶俑	168
15. 延安王庄伎乐雕砖(5件)	137	26. 西安郭家滩唐墓骑马吹排箫陶俑	168
16. 西安关庙吹笛伎乐玉带铐	139	27. 西安韩森寨唐墓彩绘参军戏陶俑(2件)	169
17. 西安关庙吹筚篥伎乐玉带铐	140	28. 西安韩森寨唐墓彩绘乐舞陶俑(2件)	169
18. 西安关庙击拍板伎乐玉带铐	140	29. 奏乐铜俑(10件)	171
19. 西安关庙弹琵琶(?)伎乐玉带铐	140		
20. 李寿墓石椁坐部伎奏乐图	141	附录	172
21. 李寿墓石椁立部伎奏乐图	142	附录一 图片索引	172
22. 西安何家村乐舞浮雕金杯	143	附录二 部分音乐文物形制数据表格	176
第二节 壁画	145	附录三 本卷未收乐器存目	184
1. 李寿墓乐舞壁画	146	附录四 本卷未收音乐图像存目	185
2. 李爽墓吹笛壁画	146	附录五 陕西音乐文物研究文献索引	186
3. 李爽墓吹箫壁画	146	附录六 陕西音乐文物分布图	188
4. 苏思勖墓乐舞壁画	147		
		后记	190



天津卷

天津音乐文物综述	193
第一章 乐 器	195
第一节 铜 钟 镂	197
1. 饕餮纹铙 (一)	197
2. 饕餮纹铙 (二)	198
3. 雉形饶	199
4. 叔旅鱼父钟	200
5. 逆钟	201
6. 克钟	203
7. 克镈	205
8. 蟠龙纹钮钟	205
9. 蟠虺纹甬钟 (一)	206
10. 蟠虺纹甬钟 (二)	206
第二节 钧于 铜鼓	207
1. 虎钮钧于	207
2. 铜鼓 (一)	208
3. 铜鼓 (二)	208
第三节 磬 琴 陶 坨 藏鼓	209
1. 青玉磬	209
2. 玉壶冰琴	210
3. 玉韵琴	211
4. 陶埙 (2件)	212
5. 象牙藏鼓	212
第二章 图 像	213
第一节 绘画 年画	215
1. 番王按乐图	215
2. 岁晚宴乐图	217
3. 过皇会图	218
4. 杨柳青年画“四艺雅聚”	222
5. 杨柳青年画“庆赏元宵”	223
6. 杨柳青年画“琴棋书画”	224
7. 杨柳青年画“马鞍山俞伯牙抚琴”	225
8. 杨柳青年画“十不闲”	226
9. 杨柳青年画“乐不够”	227
第二节 器皿饰绘	228
1. 白玉乐人纹带板	228
2. 唐三彩舞蹈人物纹扁壶	228
3. 青花海水八仙人罐	230
4. 青花吹箫引凤图人物暖碗	231
5. 青花吹箫引凤图人物葫芦瓶	231
6. 青花婴戏纹罐	232
7. 方于鲁妙歌宝轮墨	233
8. 仿成化青花文会图碗	234
9. 吉祥如意款黄底婴戏纹杯	234
10. 黄地粉彩描金婴戏纹兽耳方尊	235
11. 仿乾隆款粉彩仕女乐舞图瓶	236
12. 竹雕香山九老笔筒	237
13. 竹雕竹林七贤香筒	237
第三节 乐俑 雕砖	238
1. 灰陶乐舞俑	238
2. 白瓷舞人	238
3. 独乐寺塔乐舞雕砖	239
4. 伎乐画像砖 (一)	245
5. 伎乐画像砖 (二)	245
附录	246
图片索引	246
后记	247



陕西音乐文物综述

方建军

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史称“三秦”，分为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地区。它的东部与山西省和河南省接壤，西部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相连，南部是湖北省和四川省，北部跨黄土高原中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接。

陕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即有人类活动。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分布着一些重要的文化遗迹，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商代，这里是商王朝版图的西域，境内分布着几个重要方国。在周秦汉唐时代，这里是王都的所在地，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心。陕西地区自古音乐文化就曾得到高度发展，这里发现的大量音乐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面貌。

陕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之一，其中音乐文物占有相当比例，分布于省内 30 多个县市。

陕西地区在古代就曾发现过音乐文物。如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城固县就曾出土了 12 件编钟。又如著名的克钟、梁其钟、鲜钟等，都是在清代或 1949 年以前出土于陕西扶风的。

1949 年以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重要的音乐文物在陕西陆续被发现。从本卷的收录情况看，陕西发现的音乐文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不同材料制造的不同种类的乐器，时代大多在汉代（含汉代）以前，少量晚至元明；另一类是反映古代音乐生活内容的不同质料的画像和雕塑等美术作品，时代基本在汉代以后。这两类音乐文物分布于陕北、陕南和关中三个地区，以关中地区数量最多，也最为精美。

陕西考古发现的古代乐器大多出土于关中地区，少量出土于陕西南部，尤其在宝鸡、扶风、凤翔、眉县、咸阳和西安等地，重要的发现最多。

陕西各地所出土的古代乐器主要隶属于仰韶文化、周文化、楚巴文化和秦汉文化，以周文化和秦汉文化发现的乐器数量居多。乐器的品种包括打击乐器（体鸣和膜鸣）、吹管乐器（气鸣）和弹拨乐器（弦鸣）三个类别，其中以打击乐器所占比例最大，且主要是钟磬之类的“金石之乐”。

陕西发现的打击乐器计有陶响器、磬、铃、铙、镈、甬钟、铎、钮钟、钲、𬭚于、鼓、锣、钹等 13 个品种。

陶响器在临潼姜寨、铜川李家沟和黄龙西山坡都有发现，时代均属仰韶文化。姜寨的陶响器外形略似橄榄，体中空，内有颗粒物，摇之有声。铜川李家沟所出陶响器为中空的椭圆球体，且有上下贯通的圆孔，发掘者推测它可插入木柄。

磬有石磬和陶磬两种，后者属于明器。陕西发现的石磬有特磬和编磬之分，特磬见于商代至西周中期之物，如蓝田怀真坊、扶风齐镇和长安张家坡各出土 1 件。怀真坊特磬的时代属商代后期，其外形与殷墟出土的龙纹磬相似。它的倨句略见明显，已有向倨句分明、平底、股短阔、鼓狭长的倨背型磬发展的趋向。扶风齐镇和长安张家坡特磬都是平底的弧背型，外形与殷墟西区 M 93 所出 1 件（M93：2）相类。说明西周特磬当直承殷商。

编磬在周原召陈乙区西周建筑遗址、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宝鸡贾村上官村和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发现过一些。总起来看，西周的编磬在形制上已经定型，即都是倨背、平底或微内凹的凸五边形磬。这种型式的磬是东周时期倨背弧底磬的前身，表现出西周磬发展的明显进步。从本卷的收录可以看出，周原召陈乙区遗址出土的夔纹编磬和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出土的素面编磬的器形厚大质重，显出它独特的风格。

西周编磬厚大质重的特点，在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春秋中期秦国编磬上仍可看到。不同的是，秦公一号大墓编磬除底部为凹弧外，鼓、股上边也都是凹弧形，这在迄今发现的先秦编磬中尚无先例。

目前出土的周秦编磬大多保存情况欠佳，利用测音手段已难复原其固有的音阶组合。不过可以相信，西周晚期编磬的组合件数肯定要比商晚期三、五件一组有所增加。近年河南三门峡虢墓出土的 10 件一组的西周晚期编磬，或可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石磬发展到东周时期，形制统一为倨背凹底式，并被后世编磬所承袭，如西安范南村汉墓陶磬以及延安庙沟村所出明代“泗滨浮磬”即其实例。

本卷收录有少量的铃、铎和铙。铜铃在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窖藏和黄龙西山坡均有发现，凤翔博物馆还收藏 1 件汉代“长乐富贵”铜铃。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 7 件铜铃过去曾称为“编铃”，这次经过测音，发现它们并不具备规律的音阶结构。不过，早期铜铃与中国钟类乐器的产生应有着程度不同的关联。

宝鸡茹家庄和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分别出土铎和铙各 1 件，铜铎是一个执柄摇奏的大铃，为现知最早的铎。竹园沟周墓出土的铙，除柄上已具备类似西周编钟甬上用于悬挂的斡之外，其余形制和纹饰与殷墟所出商晚期编铙别无二致。由它的发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初步认识。第一，这件铙出于周墓，且时代属西周早期，它与殷墟编铙器形的雷同，表明西周早期铙当承袭商晚期铙发展而来；第二，这件铙已有悬挂装置，显出周铙的制造并非全然保守地沿袭殷商，而是有所发展和变化。这种带斡的铙，导致了铜铙安置和演奏方式的改变，使它由以往的置奏法开始向悬奏法发展。同时，它还透露出由铙向甬钟演进的信息，为探索甬钟的起源提供了资料。



在本卷收录的打击乐器当中，数量最多者当属西周甬钟，这也是本卷的主要特色之一。西周早期甬钟都是3件一组，如宝鸡竹园沟、茹家庄和长安普渡村所出即其实例。这些编钟内壁光平，正鼓部有云纹装饰，侧鼓部素面无饰。这些钟的保存情况大多欠佳，音响已非固有。从测音结果看，侧鼓音与正鼓音的音程关系有大、小三度和纯四度等，编钟的正、侧鼓音连奏不能构成谐和的音阶。因此，这时编钟的侧鼓音可能还未正式使用。

西周中晚期编钟一般都是8件合为一套，其例可看扶风齐家村出土的中义编钟和柞编钟。这时的编钟，内壁大都有从口沿至舞部的纵向沟槽，它们被认为是《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钟”里的所谓“隧”。隧的数目以偶数常见，奇数少见，且都对称分布于编钟振动的节线位置。据研究，它可以起到对编钟的音高进行微调的作用。

西周中晚期编钟每件可击奏出两个基音，即第一基音（正鼓音）和第二基音（侧鼓音）。第二基音是第一基音的上方小三度。可发第二基音的右侧鼓处，大都有一个小鸟纹之类的纹饰，以作为敲击点的标记。由此可见，编钟右侧鼓的这种花纹兼具装饰性和标志性。

8件一组的西周编钟，都是按一四声羽调式组合在一起，即为羽·宫·角·徵音阶结构，其音域可达3个八度。

我们认为，上述西周甬钟在组合、内壁、第二基音标志和音阶等方面所显示出的规律性特征，可以起到对周钟进行断代的辅助作用。

春秋早期秦国甬钟基本上沿袭了西周晚期甬钟的作风，如宝鸡太公庙发现的秦武公编甬钟，时代属春秋早期。编钟的形制、纹饰、调音方法和音阶与西周晚期编钟相同。不过，秦公钟的固有组合应是6件而不是8件，这可从编钟的铭文排列和测音结果得到验证。

甬钟发展到汉代，其体腔明显外张，形成鼓腹状。甬部大多呈竹节形，枚也不再是周代常见的圆台状叠置，而大多是泡形的。

西周的编镈是一种大型的钟体乐器，其发音低沉浑厚，余音悠长。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就出土过著名的克镈，现有1件藏天津艺术博物馆。1985年，眉县马家镇又出土了3件合为一组的编镈，时代估计为西周中期，比克镈的年代（厉王时期）还要稍早一些。

马家镇编镈体饰夔纹，体两侧和前后各有一个扉棱，两侧扉是头向下爬行的立雕虎饰，与连钮的两个凤鸟相接，体前后则是鸟形的扉棱，它的口部底视为椭方形。

马家镇编镈与徕编甬钟等10件甬钟出于同一个窖藏，这窖钟镈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尚须研究。

与宝鸡太公居秦公编钟同出一窖的秦公编镈，其组合也是3件，这与西周编镈的组合件数相同。秦公镈的形制和纹饰与克镈大体相似，这表明秦国早期的编镈制造大概主要继承西周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北宋时得于今甘肃天水的秦公镈上仍可看得出来。这件秦公镈的时代比宝鸡太公庙所出秦公镈要晚，它属于春秋前期后段。从它仍保留有扉棱看，还没有完全脱离西周编镈的影响。但是，这件秦公镈却出现了枚和钲间，表现出秦国在乐器制造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春秋晚期，编镈的扉棱消失，除镈体为平口而非凹口外，其体制与其它种类的钟体乐器大致相同。

陕西发现的钮钟属于春秋和秦汉时期者均有。春秋时期的钮钟可以举出眉县金渠乡所出5件以及凤翔博物馆收藏的3件。引人注意的是，凤翔博物馆收藏的钮钟有两件是环状钮，钮下有短直柄，形制颇为独特。钟鼓部所饰夔纹仍保留有西周作风，内壁的隧也与西周钟大致相同。另一件钮钟的钮为方形直钮，上饰绳索纹，与众不同的是正鼓部和左、右侧鼓部各饰一个小鸟纹。

临潼秦始皇陵发现的秦乐府钮钟，其形制和纹饰与过去洛阳金村周墓所出战国时期鼎氏编钟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巴蜀墓葬所出战国晚期钮钟大体相同。从乐府钟的内部结构观察，其调音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它的内壁在相当于四侧鼓处，各有一个加厚的音脊，从而发生了调音的效应。乐府钟的发现还解决了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好像乐府乃汉武帝时所立，但乐府钟的发现则证明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乐府的成立年代至少可以提前到秦代。

汉代钮钟的形制承自秦代，如西安范南村汉墓出土的陶制明器钮钟，体腔外张，成鼓腹状，与秦乐府钟属于同一类型。

陕西还发现有两种古代铜制军乐器——钲和𬭚于。这两种乐器在陕西地区的楚巴文化和秦文化有所发现。在陕南邻近鄂东、川西的旬阳、安康和西乡等地均发现有铜钲和𬭚于。旬阳雪茄烟厂楚墓所出铜钲，柄上有一兽形环，可以悬挂击奏。西乡所出铜钲体饰所谓巴蜀符号，应为巴族遗物。此钲柄上有冠而无悬挂构造，当可手持击奏。秦俑二号坑曾出土2件铜钲，为仿甬钟器制，即圆管柄上加旋和斡，但其体上不具备枚，是钲与甬钟的主要差别之一。

安康发现的𬭚于为虎钮，时代属战国时期。它的形制与湘、鄂、川等地出土的巴族𬭚于相类。咸阳塔儿坡出土的𬭚于则不同，它是龙形的钮，属战国晚期秦国制品。这件𬭚于的底口比肩大，与其它地区所见异制。

陕西发现的打击乐器还有鼓、钹和锣等。木腔带环皮鼓发现于秦俑一号坑，现已腐朽。鼓与钲伴出，且出土于军车附近，其军乐器功能显而易见。西安市文物库房还收藏1件唐代花釉瓷腰鼓。其形制为细腰，两头为喇叭状，与唐代壁画等所见腰鼓形象相类。

除上述打击乐器之外，陕西还出土有少量的吹管乐器和弹弦乐器。前者有实用的成品乐器出土，后者仅见有明器。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华县井家堡发现有陶埙和陶角，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的陶埙有1个吹孔的，也有1至2个按孔的，它们的形制、工艺和音响性能各不相同。表现出早期乐器制造的多样化特点。

半坡遗址出土的2件陶埙，有一个可以奏出准确的小三度音程，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具备两个按孔的陶埙，形制已经接近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乃至商代的圆腹平底埙，其埙体共鸣腔的扩大及造型设计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表现出仰韶文化制埙工艺的进步。

华县井家堡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角，酷似牛形态。试吹这件陶角，其发音的响亮和传远性能之强，确令人惊讶。类似的陶角，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河南的仰韶文化也有发现。

陕西发现的弹弦乐器虽然都属于明器，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如西安北郊红庙坡汉墓出有2件陶瑟，从它的外形看，有三枘三岳。它虽然不是实用乐器，但其外部形制当有所本，因而今后在陕西发现实用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又如西安中堡村出土的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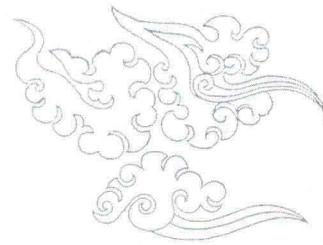


明器阮咸，具备圆形的音箱，有4个缠弦的轸和四条弦线印痕，对于研究唐代阮咸的形制有一定帮助。

陕西还有一批多姿多彩的音乐图像资料，其时代基本都在汉代至明代之间。这些图像资料包括雕刻（如画像石、画像砖、石雕等）、壁画和俑等三大类，它们的形象反映了当时音乐活动的环境、场面、唱奏人员的姿势和服饰，乐器的配备、安置和演奏方式等。如绥德的汉画像石所见建鼓舞图，唐李寿墓的石椁线刻坐、立部伎奏乐图，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八棱乐舞金杯，唐李爽墓的奏乐壁画，唐俾失十囊墓的乐俑，唐鲜于庭海墓的骆驼载乐俑等，均为著名的实例。

音乐图像资料以反映乐器演奏形象者居多。在考古发现汉唐宋明乐器实物较少的情况下，乐器图像资料就显得比较珍贵，它们为研究乐器的形制演变提供了参考依据。以唐代箫（排箫）为例，在陕西有纪年唐墓中所出雕刻、壁画和陶俑上均有反映。从箫管的长短排列观察，大体有参差型和等长型两种。以往外国学者都认为，唐代箫由西域传入。但唐代箫的型式在中国中原地区早有使用，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即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参差型箫，这说明唐代箫并非由西域或外国传入，而是沿袭中原地区的前代排箫发展而来的。

一系列的音乐考古发现表明，陕西地区的音乐文物仍有相当的地下潜藏。这里发现的音乐文物不仅反映了一种地域性的音乐文化面貌，而且还表现出时代的风尚。充分掌握并研究陕西地区的音乐文物，对丰富和充实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的内容将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乐 器



第一节 陶埙 陶角

第二节 陶响器

第三节 磬

第四节 铙 锣 铃

第五节 角钟

第六节 钧钟

第七节 钧钟

第八节 钟 钧于

第九节 腰鼓 锣

第十节 瑟 阮咸

钹